



919个“妈妈”织起乡村儿童保护网

——中国扶贫基金会童伴妈妈项目的儿童福利探索

本报记者 顾磊

填补专业服务空缺

2003年,许世琴和丈夫离开家乡周家桥村,去福建晋江的一家鞋厂打工。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1岁,由婆婆照顾。两口子白天在厂里做皮鞋修剪,每人每月工资约700元,晚上去另一家企业做工。

每隔三四天,夫妻俩赶在上工之前给家里打电话,只为听听儿子的声音。春节回家,孩子特别高兴,但是离家返工的时刻,总是在泪水中度过。就这样过了四五年,许世琴忍受不了思念的煎熬,把读小学的儿子接到了福建上学。

另一位妈妈戚鹤,小时候曾长期留守,与奶奶相依为命。2007年,她离开5个月大的女儿,去广东珠海的一家化妆品厂打工。每当看到别人的孩子,她的眼睛就挪不开,听到那首《留家的孩子想妈妈》的歌曲时,她会哭上半年。

2010年,许世琴和丈夫为了照顾孩子,回到了家乡。戚鹤回乡则在2011年:“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留守。”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却可以陪着孩子长大,而在他们的周围,仍有许多留守儿童需要陪伴和关爱。

民政数据显示,许世琴和戚鹤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2015年留守儿童数量为7万余名。

七星关区曾发生留守悲剧事件,政府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关爱留守儿童,但光花钱是不够的,当地在乡镇一级设立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中心,在村一级明确至少有一位儿童主任,机构和队伍有了,如何开展专业服务又是一道难题。

2016年,童伴妈妈项目进入七星关区。该项目发起方中国扶贫基金会认为,当时留守儿童困境的核心在于因监护和陪伴缺失导致的安全问题、心理问题等。基于此,项目在每村聘请一位专职儿童守护专员——“童伴妈妈”,建立一个“童伴之家”,将所在儿童的福利、安全、健康等问题纳入其服务范畴,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项目建立的县乡村三级福利递送体系及横向联动机制,可联合多个政府部门及外部专业支持方为孩子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童伴妈妈”项目为试点村每村每年配备5万元资金,用于场地运营、补



江西省安远县凤山乡走马岗社区童伴妈妈杨清华带孩子做游戏。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贴发放、培训督导等方面。许世琴和戚鹤都成了“童伴妈妈”,经过多次培训,她们掌握了专业方法,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从此,村里的孩子们有了贴心的“妈妈”。

激发儿童政策创新

2016年是政策的重要转折节点。当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由民政部门牵头,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计生等部门和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参加的领导机制。

“由民政部门牵头”的政策对童伴妈妈项目扩大规模影响深远。该项目2016年在贵州启动时,合作方是贵州省民政部门,项目村为100个,分布在10市的10个县(区)。

服务留守儿童的关键,在于解决福利递送的“最后一米”。项目在村里有了专职的儿童工作者和专门的儿童场所,且有一套专业服务的方法。七星关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查说:“与非项目村对比,孩子们更加活泼阳光,而且安全保障更扎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曾于2018年率队对童伴妈妈项目川黔两地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有干预与无干预差距明显;项目实施时间越长,干预效果越显著;以生活指标为例,项目在提高儿童社交能力、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改善生活环境方面效果显著。

邓国胜表示:“安全指标方面的统计检验效果出来后,我们团队感觉很振奋。当地相关部门在座谈中表示,凡是有项目干预的村,这两年基本没有再发生儿童溺水事故了。”

获得认可的童伴妈妈项目,触发了七星关区公共政策的创新。自2017年起,该区出台“两园计划”,在1804个自然村寨设置“心情家园”,在517个行政村设置“春苗乐园”,年投入300余万元,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借鉴的正是童伴妈妈项目的运作模式。

遗憾的是,该项目运作至2019年终止。王查告诉记者,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紧缺。当地近年在困境儿童的基本保障方面的投入稳步提升,包括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临时救助、大病救助等在內,区本级财政年度支出约为1000万元,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待提升,目前难以保证对服务性项目的持续投入。

记者获悉,截至2020年底,贵州省的童伴妈妈项目村分布于24个县(市区),累计达273个。贵州省民政厅申请财政资金,为每个项目村配套支持1万元,项目已形成政社合作的成熟模式。

构筑福利递送生态

截至今今年7月,“童伴妈妈”项目在四川、贵州、江西、湖北等地的79个县(市区)919个村提供服务,覆盖儿童52.5万名,累计筹措资金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配套支持2346.35万元。

按项目最初设计,项目执行3年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团队将撤出,由当地“接棒”。目前,该项目在四川已由共青团四川省委接手持续开展。贵州项目执行3年后,将与当地商量,继续联合更多社会力量,持续深入开展项目,巩固项目成果。

在不少地方,童伴计划的长期存在

已成为当地儿童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贵州省绥阳县是全国救助改革试点县。2016年,童伴妈妈项目在绥阳县9个乡镇的18个村庄落地。时任绥阳县民政局局长的郑德权介绍,当地将项目实施与儿童福利政策整合,基本上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拉近了干群关系。

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童伴妈妈”的影响力正在超出村庄。当地民政部门正探索健全儿童保护网络,让“妈妈们”成为家、校、社区的联络者,帮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有项目的地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改善,促进了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认为‘童伴妈妈’是新乡贤,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纽带。”邓国胜介绍,在不少地区,“童伴之家”已成为村民互动和交往新的公共空间,在缓解干群关系上有明显效果。

童伴妈妈项目对儿童主任制度的完善也起到积极作用。2016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到要在全国每个村居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岗位,这意味着“儿童主任”模式被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护事业。

该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中,童伴妈妈项目起到了示范效应。不少“妈妈”已成为本村的村干部、儿童主任或为儿童主任提供能力培训,例如许世琴和戚鹤均已成为村委会副书记。此外,童伴妈妈项目为国务院妇女儿童工委主导的“儿童之家”探索提供了示范。

项目专家建议,应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推广项目经验,将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福利儿童保障体系纳入政府预算。“建议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或者PPP模式,从而更好地推动项目,覆盖更多地方。我们还建议将‘童伴妈妈’的培养工作与本地儿童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让‘赤脚社工’能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工行列。”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重庆市铜梁区政协调研关注特殊教育小记

通讯员 文博 本报记者 凌云

举手、抬头、踢腿……这些简单的动作对普通孩子而言轻而易举,但对一些特殊的孩子却并不容易。9月17日,在重庆市铜梁区特殊教育学校的运动室里,一名脊椎畸形学生正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康复训练:靠墙抱膝而坐,竭力展背抬头接触墙面,2厘米、1厘米……近了、更近了,豆大的汗珠从孩子脸上滴落,身体微微颤抖着,终于成功了!安静的教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前来参与特教发展情况调研的铜梁区政协委员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你笑起来真好看!”听到来自蒲吕中学音乐老师刘芸谨委员的赞美,孩子笑得灿烂无比。

如何让特殊的孩子也拥有灿烂的人生?这个问题,自从3年前在教学实践中发现“不一样”孩子后,刘芸谨就一直在关注、倾听、调研。去年,她提交的《加强我区特殊教育发展的建议》被区委教委吸收采纳,还直接催生了当年社会福利界别的助残捐赠活动。

十届区政协履新以来,关注特教是每年的“必修课”。特教专题协商、特教资源教室建设专题视察、6万元的助残爱心捐赠……越来越多的委员与刘芸谨成了同行者。

调研座谈会上,从特教学校了解到今年6月举办的重庆市第六届残奥运会上,学校培养的学生获得了7金3铜的好成绩,从事艺术工作的柏毅委员激动

地拍着大腿:“多好的宣传素材,要整合文艺圈的力量创作报告文学和视频短片,让更多人关注这群有梦想了不起的孩子!”擅长书法的柏毅还主动赠送书法作品,激励孩子们拼搏进取。

“一个‘唐氏’学生在入学3年后,终于在10岁那年喊出了人生中第一句‘妈妈!’”这个故事让从医的刘仁健委员思考如何预防残疾,他建言大力倡导加强婚前、孕前健康检查,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及儿童早期筛查和早期干预。

一个简单的举手口令重复100遍才有回应,“苹果”的发音要反复教上百遍,1带19的工作量……看到特教老师辛勤付出之余岗位津贴微薄,来自基层卫生服务中心的孔中委员希望卫生系统和教育系统联合发力,为他们做好心理疏导,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特教体系和配套保障机制。

“我的家属是特教老师,到她工作的地方真正看了、听了、感受了,才知道她有多不容易!”区政协社法委主任刘兵表示,除了整合委员建言形成调研报告外,还将牵头组织更多志愿帮扶、爱心捐赠活动。

调研中,刘芸谨委员主动找校长加了微信,希望能给孩子们上音乐课;孔中委员拿着笔记本搜罗起了特教老师心理问题的个案;柏毅委员已经开始对接报告文学相关事宜了……这份特殊的爱,人人都想出一份力,尽一份心。

4个小时完成的“生命接力”

本报记者 王惠兵

9月14日下午3时,最后一名白血病患儿送进福建省莆田城区患者家属手中。这场由福州出发的“生命接力”,历经近4个小时圆满落幕。

9月10日,自莆田市仙游县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莆田部分地区纷纷按下“暂停键”,对人员出行和物资转运造成较大影响。

“大家现在药都快吃完了,快递又没办法寄。”孩子出现发烧、炎症,急需药品……9月13日,莆田市多名白血病患儿家属在当地病友微信群里紧急求助。因疫情形势严峻,这8名患儿既无法到福州市接受治疗,也无法在当地顺利购买到日常所需药品,面临断药风险。

隔天,接到这些紧急求助信息后,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紧急行动。“我们原打算开车将药品直接送到莆田和仙游高速公路路口,让家长来取,但担心送完药

后回来需要隔离,而大家身上还有许多志愿服务工作要做。”福建省助困公益协会筹资负责人金淑萍说,“当时,我们联系了很多快递,都说停运了。心里着急,也没办法。”

该协会一边通知患儿家属先托人买好药品送到协会办公室;一边联系公安部门、疾控、媒体单位和志愿者等,确定接送方案。14日上午11时许,在各方协助下,一箱箱贴有药品名称和数量、患儿名字、电话和家庭地址等信息,并附有“莆田加油”“仙游加油”字样的药品从协会办公室出发,经过全面消杀,几番辗转接力,第一时间到达患儿家长手中,保证了患儿的及时用药。

“孩子终于用上药了,特别感谢所有爱心人士。”从交警手中接过药物后,家住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的患儿家属林女士激动地说。



助力冬奥 纳通捐赠专用口罩61万只

“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是冬奥会赛前一次重要的全面实战检验,为积极配合北京赛区(海淀)组委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9月24日,纳通科技集团为北京赛区(海淀)组委会捐赠专用口罩61万只。

据了解,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纳通科技集团迅速响应国家号召,克服种种困难,5天建立了口罩生产线,缓解了口罩紧缺问题,成为保障北京、天津抗疫物资生产供应的重点企业。一年多来,纳通科技集团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已累计向政府机构、学校、医疗卫生和公益组织等捐赠口罩1000多万只。

本报记者 王硕 摄



各地纷纷出台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相关政策:

重视收益分配 发挥帮扶作用

本报记者 顾磊

继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今年5月出台《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简称《意见》)后,截至目前,江西、广西、福建、河北、甘肃、河南、山西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

《意见》明确,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是指党的十八大以来,使用各级财政资金、地方债券资金、东西部协作、社会捐赠和对口帮扶等投入形成的扶贫项目资产,包括实物性固定资产、资产收益扶贫、入股分红等权益性资产和多年生生物性资产。

做好后续管理的前提是摸清扶贫项目资产底数。目前,各地将扶贫项目资产分为3类,即经营性资产、公益性资产和到户类资产进行管理。《意见》对这3类资产有概括性描述:经营性资产主要为具有经营性质

的产业就业类项目固定资产及权益性资产等;公益性资产主要为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等;到户类资产主要为通过财政补助等形式帮助贫困户发展所形成的生物性资产或固定资产等。

记者梳理发现,围绕《意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出台具体政策。福建省对3类资产的界定相当明确,其中,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使用扶贫资金建设或补助形成的农林牧业产业基地、生产加工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电商服务设施、光伏电站、帮扶车间、机器设备等;公益性资产主要包括使用扶贫资金建设的道路交通、供水饮水、卫生、电力设施、综合服务公益性基础设施,还包括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类固定资产等。河北省亦有类似规定。

县级政府在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

理中扮演重要角色,江西省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应对3种类型的资产分别建立县级扶贫项目资产台账、行业部门分类台账和乡村明白台账。

后续如何管理?关键在于落实责任。《意见》从省市到村集体均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尤其是县级政府,要对本县域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履行主体责任,明确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责任清单。从各地政策来看,基本都按照这一框架细化举措,例如福建省提出,要制定县级扶贫项目资产清单,明确相关部门、乡镇政府管理责任清单。

此外,《意见》强调要“探索多形式、多层次、多样化的管护模式”,尤其是做好风险防控的同时,要使扶贫项目资产更好地发挥效益。对此各地政策有不同的做法,例如河北省,明确规定对光伏扶贫电站、农村饮水工程等专业性较强的扶贫项目资产,可通过购买服

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管护。

扶贫项目资产的收益分配使用方面,政策强调的是要重视发挥帮扶作用,而且经营性资产收益分配应体现精准和差异化扶持,扶贫项目资产收益重点应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对此《意见》明确规定:“严禁采用简单发钱发物、一分为之的做法进行收益分配。”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中,应有效降低返贫风险,且要注重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河北省的政策强调,将资产收益优先用于扶持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户增收、发展村集体经济、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山西也提出,将资产收益重点用于帮扶老弱病残等缺乏劳动能力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人口。

随着各项政策落地,扶贫项目资产的后续管理将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更好的保障。



洁净家园志愿行

自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集结号”吹响以来,贵州省遵义市各地主动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融入日常工作,以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为重点,积极动员辖区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提高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图为遵义市汇川区董公寺街道党员志愿者向居民宣传相关知识。

李玉 摄